

收稿日期:2020-12-06

#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文化领导权建构论析

张廷干

(盐城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与建构,有其大革命过程中文化与政治的不平衡,以及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庞杂而不平衡的深刻时代背景和客观根源,从而蕴含着政治性与文化性的双重属性,其实质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流地位和话语权。基于此,中国共产党确立起文化领导权建构的策略原则:干部教育与加强党对宣传工作领导和创新的双向涵摄;主体文化的形态建构与文化主体广泛生成的内在耦合;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与强化民族文化内核的有机融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一体推进。这些策略原则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策略原则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2-0011-12

**作者简介:**张廷干(1971—),男,江苏灌云人,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道德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2.016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要“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sup>[1]</sup>。政治领导权的巩固离不开文化领导权的有效建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政治建设作为根本,同时强调以意识形态为引领的文化建设、以理想信念为核心要素的思想建设的基础性地位。在党的延安时期,政治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的相互作用,就明确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实践之中,一方面,蕴涵着这样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属性,即政治性和文化性;另一方面,以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流地位成为当时领导文化运动的实质。有学者指出,“延安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的象征”,因为“这次革命带来了一个完整的问题系”,以至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思想、价值观和言行”的“某些部分仍然承接和享受延安成果的影响”<sup>[2]</sup>。中国共产党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加强文化领导权建构的策略措施、经验原则及成效意义,仍然可以为新时代党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提供重要借鉴。

## 一、加强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背景

早在大革命失败时,中国共产党人即在反思中认识到这一失败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于:未能对

文化运动乃至文化领导权给予足够重视,从而造成文化运动的滞后。基于这种反思,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文化运动,新哲学即辩证唯物论迅速成为重要思想文化力量,“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曾受此思潮的影响”<sup>[3]</sup>。中国共产党重视文化运动、强化文化领导权建构,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首先,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以及政治斗争策略的改变。毛泽东早就认识到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强调了文化的革命性作用。延安时期因为民族危机依然较为严重以及革命形势发生的全局性变化,从革命发展两个阶段的战略性高度来看,中国共产党面临两个彼此密切相关的重要任务:“完成人才储备”和“完成意识形态储备”,共同服务于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目标。

为此,中国共产党改变政治斗争策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救亡运动和新启蒙运动。“其思想动因,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即文化运动必须与政治运动相辅而行。”<sup>[4]</sup><sup>112</sup>从完成“两个革命阶段”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出发,文化领导权建设承担着复杂而繁重的中国革命使命。一方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不仅推行奴化思想文化,而且也加强了政治进攻,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理论宣传任务更加复杂也更加艰巨;另一方面,“大部分党员的政治文化的水准很低”,“许多同志对革命、对党、对统一战线的认识,都非常模糊”。同时,党内工农出身的干部占主体部分,存在着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不仅在组织层面影响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sup>[5]</sup>,而且其能力素质与党担负的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不相适应。因而,随着日本侵略而导致的民族危机加深、奴化思想文化的推行,以及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文化运动需要与现实政治、政治实践相结合、相促进,这需要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解决文化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二是建构现实的主体基础即广泛的群众基础,推动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大众化和生活化,当时被认为引领“中国化”潮流的新启蒙运动,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与中国政治和社会斗争具体实践的结合<sup>[6]</sup><sup>179</sup>。

其次,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和文化领导权问题的解决不相适应。哲学思潮自抗战以来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且随着政治军事和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延安时期,在形式多样的理论冲突中展开的思想论争与理论交锋中,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主张打破国民党主导下的文化封闭状态,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启蒙大众,重新认识和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1)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过程中,批判了“新人文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倾向;在新启蒙运动中,特别是在“新哲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批驳了自由主义主张的以唯物辩证法和近代以来西方逻辑经验论等理论的“化合体”作为哲学基础的理论主张,坚持建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核心和指导的新文化,坚定了这样一种信念:只有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才能指明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经济上政治上的社会变革之路。(2)中国共产党内部,大的方向和目标一致,但围绕着重大的战略和道路选择以及路线方针在具体的政策措施、方式方法、行动方针等方面也都存在着分歧;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也存在着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的斗争;(3)不同党派及政治军事力量之间,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论,相互之间也展开过激烈的理论斗争。特别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和其他反动思想也接连不断地出现,借助当时政权力量,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大肆诋毁与攻击。比如,陈立夫的“唯生论”与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声称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中国的命运应该寄托于国民党,只有中国国民党,才能承担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重任,妄图从理论上打击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具有唯心论和神秘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潮,有着浓厚的大资产阶级反民主倾向,在当时的思想文化战线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而且“因为是与政权力量相结合的缘故,在中国十年左右的思想战线上,却能够保持了相当的影响”<sup>[7]</sup>。(4)

当时许多到延安的文化人,对“将要被赋予文化领导权的地位”以及“开展新文化范式之建构的迫切性”并不是很清楚,其观点和旨趣仍停留在对反动文化进行批判和破坏的左翼文化的层次上,从而与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所要求的建设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形态,适应和维护乃至弘扬未来国家意识形态、有效解决未来文化领导权这一根本问题不相适应<sup>[8]</sup>。

最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结构中思想文化庞杂而不平衡。艾思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未能“科学地分析批判以前革命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一教训的结论是:在众多原因之中,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依靠是最主要的原因。因而,需要在民众中进行革命的发动、宣传与普及,进而使他们认同和支持革命思想。问题在于:“文化在中国,是非常庞杂而又极不平衡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也正是非常庞杂而又不平衡的缘故”,因此,“在这半封建的基调里面,各种各样的文化要素参杂着,于是就有了目前中国文化上的庞杂而不平衡的现象”<sup>[9]</sup>。不仅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达到的范围,还只是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兵大众中去”,而且新启蒙运动也存在着不平衡性,结果是这种新哲学与广大工农兵群众并未能实现真正的结合。1934年以后,新文化运动也是在极不平衡的状况下发展着: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有着自由的政治环境的,也存在着新哲学、新文化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互结合的方便条件。然而,由于主观主义和党八股的危害,以及许多文化工作者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不正确观点和态度,新文化运动没有能够获得健全地发展。而在国统区内,因为政治自由的缺乏,限制了新文化运动的范围,因而只能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进行,以及文化工作者本身也存在着许多错误和缺点,特别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而阻滞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而新启蒙运动的社会范围,“离开‘我们的新文化应该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并为工农兵大众所有’的目标,还是相差甚远……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国民党政府对于人民的反动统治,政治经济的严重压迫,工农兵大众享受文化教育权利的被剥夺;另一个是大部分新文化工作者还没有解决和工农兵大众密切结合的问题”<sup>[10]</sup>。这样,要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文化武装群众,就必使之落实到夺取文化领导权上来,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之一。

## 二、加强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双重属性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构蕴涵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属性,即政治性和文化性。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革命文化,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进而取得胜利,这是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现实的任务和最重要的急需解决的任务,即政治属性;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方法,批判性地传承并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使之适应并服务于中国革命这一现实的中心任务,是文化属性。政治属性发挥着对文化属性的主导作用,而文化属性则服务于党建构文化领导权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具体实践,这两个基本属性的有机配合,构成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要素。

政治性与文化性双重属性的凸显,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与发展中存在的深刻反思。当时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存在两个缺陷,即“在系统地批判中国传统哲学体系方面,在完满地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现实政治方面,他们都有所疏忽”<sup>[11]</sup>。柳湜在《从五四运动至今日》一文中也指出,那时个人或政党的文化运动,充其量也只是作为政治运动的一种补充物,而未能实现二者的有机配合,即不是“文化运动配合着政治的行动”,也不是“文化自身直接从群众实际的要求上反映政治”<sup>[12]</sup>。

这种双重属性集中体现在文化领导权的建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延安时期,全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学习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

文化、革命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党是否成熟的标志,不能仅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词句的熟悉程度,而是应把是否能够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及其思想方法,深入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以及当时革命运动的具体情况和趋势。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在总结中国共产党18年历史经验教训时,都特别强调这种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把是否能够和善于“结合”作为衡量党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在其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sup>[13]707</sup>,同时,必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立场与方法,批判继承民族文化历史遗产,并进一步转换为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思想方法<sup>[14]658</sup>。

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和文化领导权,对全体民众特别是工农群众进行文化启蒙以提升政治觉悟的方式有新启蒙运动和学术中国化。尽管新启蒙运动并没有能够达到所预期的文化乃至政治目标,然而新启蒙运动和学术中国化过程中明确渗透着政治性和文化性的要求,这一点还是确定的。新启蒙运动中关于建立一种“新文化”的目标问题,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论争,这一争论在本质上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sup>[4]118</sup>。一方面,新启蒙运动的着重点是要为“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发扬光大“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接受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成果,从而“多方面地创造新文化”;另一方面,在新文化以什么为核心主体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作为新启蒙运动哲学基础的是什么样的哲学文化形态?是以辩证唯物论为核心还是以其他哲学或辩证唯物论和其他哲学思潮的混合体作为核心或基础?张申府试图把当时西方流行的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建构新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针对张申府所看重的“逻辑经验论”或“逻辑实在论”,陈伯达批判了其主观唯心论实质,称其为“辩证唯物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sup>[15]</sup>。

1939—1940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等地发起与领导学术中国化运动。这一运动一般被学界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术中国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核心,并有着自己独立的内容、任务和目标。首先,学术中国化运动在哲学和历史学两个领域成果显著。中国化的核心与本质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培元说,我们的哲学家如果做不到系统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内部的联合与斗争,以及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战略与策略、政策,并把这些提到哲学的原则上来,“则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了解始终是比较抽象的,我们就无法把历史唯物主义真正中国化”<sup>[16]</sup>。其次,加强了唯物辩证法在学术研究中的指导作用,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地位。学术中国化运动着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在抗战中的各方变化,怎样来使这些变化向进步的方向走去<sup>[17]</sup>。因而,学术中国化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且是现实的政治性问题。最后,学术中国化提倡在充分吸收而不照搬世界先进文化和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中创造新文化。“中国化”的正确意义在于:把批判继承文化遗产与适应并推进现在的实际状况和要求结合起来,着力于未来目标,改造和吸收一切学术,以“帮助解决新中国建设中所有问题”而成为“新中国所有的最进步、最高水准的生活和文化的有机部分”,也必将对世界有所贡献而“属于世界的了”<sup>[18]</sup>。因此,学术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而且在其核心内容上,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更新更高的形态。

### 三、加强文化领导权建构的策略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性理论形态的确立并使之进一步成为富有战斗性的理论形态是同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导权建设方面所进行的创新理论宣

传、把握文化心态体系的核心要素以及通过党性修养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等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策略原则,贯穿于党对意识形态的坚强领导、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的过程中。

### (一)加强理论宣传:干部教育与加强党对宣传工作领导和创新的双向涵摄

干部教育与党面临的任务以及党内的思想文化状况密切相关。有计划地进行干部教育,融入党史教育的理论宣传,一方面,可以帮助党员有效克服自身理论落后或理论准备不足这一问题,增强战斗力,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另一方面,可以造就一大批合格的党的宣传工作者,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武装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保证了党的政策宣传工作的正确方向。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对于党史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把唯物史观作为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确立正确的党史观,并根据党史学习教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方式方法的创新。

延安时期,对干部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如何有效开展干部教育和如何做好宣传工作这些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联共产党《联共党史》的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针对学习《联共党史》之前宣传工作中党的政策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以及历史唯物论相脱离<sup>[19]</sup>这一缺点,一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政策与抗日实际的结合;另一方面,加强干部的策略教育,尽可能充实策略内容,加大党的政策教育和学习<sup>[20]</sup>。

1. 结合《联共党史》的学习创新宣传方式。《联共党史》对党理论宣传工作的深刻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的继承性与完整一致性。针对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分离开来这一现象,联共(布)中央在编写《联共党史》时提出,需要“在宣传领域上消除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间的有害的脱离”<sup>[21]</sup>,强调指出,列宁和列宁主义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受此影响,在延安所开办的学校中,中国共产党从整体理论形态上,“把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当作独立的学说来讲授,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基础’”<sup>[22]</sup>。其二,中国共产党坚持并加强了对理论和党的政策宣传工作的领导,并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党史教育统一起来。在抗战初期,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存在着“重组织轻宣传”的倾向,《联共党史》的传入与学习成为党的宣传工作的一个新起点。宣传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即《联共党史》批评孟什维克所说的宣传组织上的松散现象的危害主要在于:一是削弱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二是损害党员独立研究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心<sup>[4]226</sup>。结合《联共党史》的学习,中国共产党检讨了在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相当严重的应付现象,改变了宣传工作中存在的“手工业方式”,“消灭自流主义的现象”,加强了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纠正了党在宣传工作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与党史教育分离的缺点,以党员干部教育为主体,把反对教条主义为宗旨的历史教育落实到革命的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实践之中。

2. 分类对干部进行党史教育与政策培训。《联共党史》是苏联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的重要文件,学习过程中对不同层次的干部区别对待。党中央根据文化水平差异导致的学习进度不平衡,把干部分为甲乙丙丁四类型,甲类是具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干部,以《联共党史》为基本课程同时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后两个类别干部集中学习文化课和“中国问题”,达到相当水准再转入甲类课程<sup>[23]</sup>。中国共产党把研究与学习《联共党史》、反对主观主义和清算党的历史作为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sup>[4]231</sup>。而对于主观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很长时间

内占据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危害极大,“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sup>[24]372</sup>。在几次深入讨论的基础上,最终清算了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错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sup>[25]</sup>,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 (二)推动民众启蒙:主体文化的形态建构与文化主体广泛生成的内在耦合

要使马克思主义作为进入中国革命实践的主导性理论形态,并进一步成为富有战斗性的理论形态,应通过其真理性力量提出两个方面的时代要求:一个是在与其他竞争性理论的辩驳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共产党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引领机制;另一个是在实践中获得最广泛的人民性基础,在民众中进行革命的发动、宣传与普及,进而使他们认同和支持革命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文化领导权建构与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文化武装群众具有本质一致性,延安时期坚持在主体文化形态建构与文化主体生成的耦合中推动民众启蒙。

1. 努力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地位的革命文化形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到新启蒙运动、学术中国化等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其中贯穿着的一条重要线索是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思想文化。新启蒙运动展开对“五四”进行反思的基本理论武器正是以辩证法、唯物论包括唯物史观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新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贯穿其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在中国的影响力急剧扩大并最终确立。同时把启蒙对象扩大到了普通民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与那个时代的中国政治、社会斗争和社会变革等具体实践的结合,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才能指明中国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和经济上政治上的社会变革之路。

另外,新启蒙运动内部的理论分歧与论争也围绕以何种文化作为主体而进行。新启蒙运动并非有着统一的思想理论,总体上存在着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竞争。无论是陈伯达的“废止思想上外来的权威”并“从外来的权威中独立出来”以“唤起每人的自觉”,还是张申府“要求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以促进“文化的民主或民主的文化”,都把“思想自由”作为新启蒙运动的中心原则。然而,在对“思想自由”理解上,中国共产党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放任思想,而是“要在批判中求统一”<sup>[26]38</sup>。此外,在目标上,尽管都主张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创建“新文化”,然而,对于这种新文化的主体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一是主张以“新哲学”即辩证唯物论为核心主体,一是主张以西方流行的哲学思潮为正统,实现“唯物辩证论与逻辑经验论的合流”。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自由主义在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领导资格,因为它是处于进步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封建运动的主导思想,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为思想发展的桎梏了”,中国革命尽管还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却有了无产阶级这个新的领导阶级,“自由主义,也当然不能领导中国的思想运动”<sup>[26]201</sup>。无产阶级以什么思想文化指导中国革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国共产党坚持强烈的现实价值目标和“理论从属于实践”原则,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而“哪个主义能够救中国就研究哪个主义”<sup>[27]</sup>。而何干之认为,“思想运动的最高盟约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谁在民族中尽了最大的努力并证明了其思想体系最接近真理,谁“最有资格去领导群伦”<sup>[28]</sup>。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谋求解放底武器——理论与策略。唯有正确地掌握着这一武器,中国革命底胜利,才会有充分地保障”<sup>[29]</sup>。新启蒙运动中共产党人就特别强调“更前进更新的文化”,即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这一哲学基础,以及文化的“更高阶段的发展”,即蕴涵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因而,有学者指出,“新启蒙运动”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端,它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与中国政治和社会斗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sup>[6]179</sup>。

而“学术中国化”运动则已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促进唯物辩证法在学术研究、引领中国社会抗战中的各种变化以及社会形态变革中的指导作用。

2. 对民众特别是工农群众进行普遍的文化启蒙。文化启蒙不能是仅局限于特定阶层,而应扩大到一般性普通民众,这是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明确意识到的。胡绳指出五四运动最主要一点成功在于,把文化运动扩大为广泛的群众性运动,从而凸显了人民的意义,以及人民革命的传统和力量,而对此的漠视则是曲解五四的论调的共同本质。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未能“科学地分析批判以前革命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即在众多原因之中,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且仅仅从“推动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发展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五四文化运动成为结束旧民主主义和开始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时期”,而正是无产阶级这个革命阵营里的新的生力军,使得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使中国革命运动不但能提出革命上的新问题,而且为这一问题的实现准备了新的必要条件<sup>[30]</sup>,尽管他不恰当地认为五四运动仍然是一场“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由于当时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不平衡性,以及革命文化与人民群众的结合还不适应革命发展需要,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生活化成为紧迫的时代任务。那么,如何坚持正确方向,促进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人民大众的结合以建构广泛的主体基础?

第一,马克思主义化基础上的知识分子有机化。一是确立了知识分子应遵守“文学的党性原则”。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纲领性文件,以文化和政治领导者的权威性确立了文化创作和文化传播的秩序、标准和原则<sup>[8]</sup>;二是通过整风运动改造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文化的整合与建构。使知识分子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阵营中,并统一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在精神和道德乃至政治思想上进行与民族民主革命相适应的宣传与引导,促进思想文化工作与社会历史、革命形势发展以及人民大众相结合。然而,如前文所述,当时到延安的许多文化人,尽管他们倾向于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其旨趣与有效解决未来文化领导权的根本问题不相适应。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进步性与思想文化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间的不平衡性;二是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着共产主义信仰,却仍然一定程度保留着“五四”精英文化的启蒙情结,曾一度激化了干群关系,损伤了群众革命的积极性<sup>[8]</sup>。因而,需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促进知识分子有机化。而这要通过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完成:其一,强化知识分子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关系。将知识分子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之下,完全真正融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队伍之中;其二,坚持团结尊重教育并重的政策和策略营建学术生态。通过对知识分子的积极争取和批评教育,党的文化领导权获得了他们的内心认同。为此,中央颁布《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强调必须吸收知识分子,才能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统一战线<sup>[13]618</sup>。毛泽东多次强调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因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sup>[31]1011-1012</sup>;其三,在政策上引导知识分子和工农打成一片,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为什么必须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知识分子的工农化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是一致的,实现了知识分子的工农化,便实现了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最终使知识分子划清了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克服了自身的缺点,最终完成了自我蜕变而成为无产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即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培育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以此为基础实现了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文化上的领导和政治上的合法化,更好地适应了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第二,具体实践基础上实现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相互融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的

德国,并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一方面,有着指导各国家各民族具体实践的功能,从而具有普遍性的要求。另一方面,继承了德意志民族的重要哲学遗产,具有与其他任何哲学思想一样的民族性特质与民族形式,因而,在具体运用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践时,需要尊重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把普遍性真理转化为具体性真理。一味强调民族特点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就可能走向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而离开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词句,则不能很好地为特定民族人民所接受和掌握。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性与时代性的哲学,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避免过分强调传统文化的民族性而忽略时代性要求。

### (三)聚焦核心要素: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与强化民族文化内核的有机融构

延安时期或40年代初,中国革命的态势正发生着一些全局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从完成两个革命阶段的战略性高度意识到,延安时期面临两个彼此密切相关的重要任务:“完成人才储备”和“完成意识形态储备”,共同服务于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目标和任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对文化运动的领导,并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建构革命的意识形态,有意识地建构文化领导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这里的“思想”作为上层建筑即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构成特定社会文化结构系统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表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也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要在根本上加强思想建设,统一思想、整体性提升党的战斗力与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深入把握中国实际、政治革命与文化运动的内在联系进行中国革命,“非普及哲学不可”<sup>[32]</sup>。我们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和挑战,其思想根源在哲学,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思想交锋最终也都可以归结到哲学上。延安时期,强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策略特征,主要在于:

一是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革命文化及其对于动员民众参与革命的思想与精神影响力。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始终坚持学术与政治的结合、学术为政治服务,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党乃至革命群众中的广泛深刻的影响力,抵制和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的错误,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的论战,都体现出了一定政治斗争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思想建设、政治斗争的结合中建构文化领导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所主张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即“使理论服从于政治”的意识或理念。

二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民族文化内核<sup>[33]</sup>。艾思奇、陈伯达等关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研究都体现出了现实的目的性,这些研究“或为抗战所需,或为政治斗争服务,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切入点”<sup>[6]205-206</sup>。由此,在具体实际中融合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明确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题,彰显议题设置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意义”<sup>[33]</sup>。强调民族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核意义。

三是坚持民众群体启蒙、党的集体领导和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统一性。促进这种统一的关键在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在全党形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挥党的集体领导在文化领导权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其关键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在全党形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力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举办文艺活动、发行报刊杂志等促



进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精神意义即在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国民党文人企图用“中国本位文化”代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调予以坚决批判,在思想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层面捍卫了延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另一方面,深入生活实际,满足群众利益需求,促进革命思想文化理论的民众认同与理论自信。确立革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领导权的实质是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这对于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逻辑提出的要求是,真实并正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诉求。艾思奇在《共产主义者与道德》中提出,无产阶级的道德与解放全人类道德目标是一致的,在抗战的环境下,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要求树立起指导革命实践的民族的革命的新利益观,而共产党的新利益观应该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他说:“在中国的情形下面,真正的无产阶级道德和民族道德完全能够一致,共产主义者为民族道德和民主主义而斗争。”<sup>[34]</sup>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自由主义》《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中,都提出了以人民利益为主体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陈云强调指出,只有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党中央需要解决群众切身问题并在群众中讨论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共产党员要领导群众,就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sup>[35]</sup>。自下而上开展群众工作,真正去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促进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认同,这种广泛认同不仅是巩固与发展根据地以及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必备条件,而且是在现实的革命实践包括土地革命和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中获得巩固。这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文化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了稳固的根基。

#### (四)创新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一体推进

“理论自主性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关键性标志,没有这种自主性就不可能有独创性的理论建构,而没有独立的理论建构也就不可能有理直气壮的话语权。”<sup>[36]</sup>这对中国共产党建构文化领导权提出的要求必然是:要有自己的理论形态创新,并且遵循“解释世界从根本上从属于改变世界”这一哲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夯实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基础。

科学理论武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理论创新。对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延安时期,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毛泽东就提出了全党“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就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一步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原则提升为理论的要求,进行理论创新,这是关涉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延安时期,适应文化领导权建构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这种理论创新中着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体推进。

1. 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性统一。这不仅具有国际国内和党内形势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发生变化作为客观依据,而且也是回应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相对滞后问题。毛泽东深刻指出了当时存在着的理论与实践的不平衡、理论创新不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具有目标一致性:应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不足,适应政治斗争需要,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从而建立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

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对“新启蒙运动”的进一步深入:“使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以及对合理社会制度的政治诉求,即“由民族解放和封建残余解除的合理,转变到新的社会的合理”<sup>[37]</sup>。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改造中国,为了抗战胜利”“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而奋斗”<sup>[38]</sup>,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是理论的动机和目标从属于实践的动机和目标。对此,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兼做史迪威

政治顾问的谢伟思在一份情报中说:“他们(中共领导人)都是经过长期辩论和讨论,最后遵从自己的信仰和逻辑,才选择走上这条路的,他们的人生是为了其他人的权利而斗争的。”而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共领导人的现实主义和实际主义,“在延安,任何一项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主要取决于这项政策是否适合于社会的条件”<sup>[39]</sup>。

2.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性修养问题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相统一。这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实现准备了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成熟的组织化主体与领导干部群体。

第一,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巩固的大党”的内在联系。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建设一个大党”目标相联系,他说,尽管我们党现在的人数不算多,但“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sup>[24]179</sup>。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把党的建设目标确定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并将此视为一项“伟大的工程”<sup>[13]602</sup>。“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就是要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纪律教育和党的团结,其中心环节是坚持正确立场,而“布尔什维克化”即是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目标有其特定的针对性:克服党内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散漫性、自发性等<sup>[40]</sup>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思想上纠正中国革命问题上“左”或右的倾向。在全面启动“伟大的工程”之初,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从组织建设层面突出抓党性建设这一问题。

第二,加强党性修养促进文化领导权的组织主体建设。(1)阐明党性问题与建设巩固的大党的关系。为了应付长期残酷复杂的革命斗争、实现伟大历史任务,必须有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为此,全党特别是党员干部必须强化党性锻炼。(2)认识论层面的党性进一步凸显。这一层面的党性比组织层面的党性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哲学的党性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共产党丰富党性原则及其具体内容的哲学理论基础。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知道“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sup>[41]356</sup>。(3)延安整风与党性修养问题的多维度展开。中国共产党对党性问题的阐释与延安整风呈现出一种互动关系:“中共对党性的阐释为延安整风的实践奠定了法理基础”,“中共对于党性的认识与阐释也受到整风实践的影响,随着整风的进行而朝着多维度方向发展”<sup>[42]166</sup>。任弼时在提出分析党性问题的三个基本前提的基础上指出,“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是衡量党员的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sup>[43]234-235</sup>随着整风运动实践的推进,一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解决的主要“是组织问题又是思想问题”,重点批评了原本提纲中没有的宗派主义,“克服和防止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sup>[43]246,251</sup>。这与整风运动的发展相适应:已经从中央层面延伸到全党,宗派主义已经取代个人主义而成为组织层面所反对的主要错误倾向。1942年2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反对宗派主义是党性决定的发展”<sup>[41]413</sup>;另一方面,强调“向群众学习是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这种群众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党性是“大成问题”的<sup>[43]304-305,301</sup>。在这里,实际上是指出党性和人民性立场的统一性。党性蕴涵着深刻的人民性,这是衡量党员党性的又一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sup>[44]</sup>。在延安时期,刘少奇也是在立场的视角阐述推进其党性观,认为可以避免的两类错误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而犯错误(认识错误)以及由于立场错误而犯错误。前者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而后者则主要是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党的立场之上。陈云则把延安整

风运动重点批判的教条主义和《决定》中批评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论述党性问题。整风运动结束后,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各个时期的路线以及代表性错误都进行了定性,中共党内在认识论以及思想政治路线、工作路线层面达成共识。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真正成为一个政治上、理论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62.
- [2] 李洁非. 延安的意义[N]. 中华读书报, 2010-10-13(1).
- [3] 贺麟.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77.
- [4] 欧阳军喜.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 [5] 陶希晋. 论党在目前环境与任务下的宣传部门工作问题[J]. 共产党人, 1940-6-20:7.
- [6] 王海军. 真理的追求: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 [7] 钟离蒙, 杨凤麟.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3集). 辽宁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研究室, 1982:101.
- [8] 李彬, 黄卫星. 毛泽东延安时期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J]. 临沂大学学报, 2011(3):26-31.
- [9] 艾思奇. 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J]. 生活(星期刊), 1936,1(19).
- [10] 杨琥. 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C].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329.
- [11] 怀利. 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M]. 杨悦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26.
- [12] 柳湜. 柳湜文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703.
- [1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14]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15] 陈伯达. 论“新哲学”问题及其他:致张申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J]. 中国文化, 1940,1(5):31.
- [16] 和培元. 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J]. 中国文化, 1941,3(2,3):19.
- [17] 潘梓年. 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J]. 理论与现实, 1939-4-15.
- [18] 潘菽. 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J]. 读书月刊, 1939,1(3):113-114.
- [19]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1941:98.
- [20] 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党内策略教育的一些具体决定(1940年8月13日)[J]. 共产党人, 1940-9-20.
- [21] 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底宣传的决议[J]. 徐冰, 译. 解放, 1939,(79).
- [22] 杨松. 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J]. 群众, 1941,6(10).
- [23] 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J]. 共产党人, 1940,6.
- [2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 [25] 张闻天. 张闻天文集(第三卷)[M]. 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 1994:263.
- [26] 夏征农. 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M]. 上海:上海一般书店, 1937.
- [27]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 毛泽东生活档案:上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89.
- [28] 何干之. 何干之文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421.
- [29] 张静庐.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篇)[M]. 北京:中华书局, 1957:248.
- [30] 艾思奇. 论思想文化问题[J]. 认识月刊(创刊号), 1937-6.
- [3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3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4.
- [33] 兰夕羽. 延安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历史经验[N]. 光明日报, 2018-1-3(11).
- [34] 艾思奇. 艾思奇全书: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530.

- [35]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论党的群众路线[M]. 北京:大地出版社,1990:323.
- [36] 金民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稿[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96.
- [37] 陈伯达. 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J]. 读书生活,1936-9-10:4(9).
- [38] 杨松.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J]. 中国文化. 1940,1(5).
- [39] 杨凤城. 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研究[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2.
- [40]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6.
-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356.
- [42] 赵淑梅.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观[C]//杨凤城. 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166.
- [43] 任弼时. 任弼时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44]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化改革巩固成果积极拓展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5-1-14(1).

##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Leadership of the CPC in Yan'an Period

ZHANG Ting-gan

(School of Marxism,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7,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of Yan'an, the CPC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leadership, due to the complexity and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politics at that time. It was of grea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culture which was centered on Marxism to establish the dominant role and discourse power in the ideological battlefield. The CPC has formulated the strategic principles of cultural leadership: combination of cadre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minant culture and the extensive creation of cultural ent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core of national cultur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great project" of the Party. We must adhere to these strategic principl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period in Yan'an; CPC; cultural leadership; strategic principle

〔责任编辑:顾国华〕